



没有 乌托邦 的言辞

张
柠
著

张
柠 主编
文化先锋书系——刀丛文丛

花
城
出
版
社

MEI YOU WU TUO BANG DE YAN CI

张
柠 主编 文化先锋书系——刀锋文丛

没有 乌托邦 的 言辞

MEI YOU WU TUO BANG DE YAN CI



没有乌托邦的言辞

张 柠/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没有乌托邦的言辞

张柠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5. 4

(刀锋文丛/张柠主编)

ISBN 7-5360-4528-X

I. 没...

II. 张...

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18400 号

责任编辑: 邹靖华

平面设计: 朱 竞

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厂

(广州市永福路 44 号)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25 2 插页

字 数 260, 000 字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6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4528-X/I·3614

定 价 22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张柠，中国当代著名先锋评论家，任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，目前客居北京，为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客座副研究员、北京师大“媒体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”客座研究员、中央民族大学“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”兼职教授。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。著有《叙事的智慧》、《诗比历史更永久》、《飞翔的蝙蝠》、《时尚鬣犬——文化时评集》、《文化的病症——中国当代经验研究》、《土地的黄昏——中国乡村经验的微观权力分析》等。



目 录

第一辑 生产中的文化与媒介中的文化

- 3 速朽时代的文化肥胖症
- 6 帮忙文人和中国精神重建
- 9 文化评价的有罪推论和无罪推论
- 12 处女签名与初夜权经济
- 15 数字联合国里的统计学游戏
- 18 奥运，警犬和验尿师
- 21 雅典体育场上的中国庙会
- 24 人民的钱包十面都是埋伏
- 27 传统节日的形而上学
- 30 我们现在要不要做父亲
- 34 60年代的枪声与经济糖尿病
- 38 中世纪的瘟疫和社会风尚
- 42 猴文化与权文化
- 46 想象西部的四种方式
- 50 对峙中的北京老城与环线
- 53 一个城市包围农村的典范
- 56 华南鹦鹉和全球化时代
- 59 人种学和美学焦虑症
- 62 波布族，解放路上的文化怪物
- 66 休闲或忙碌的经济学
- 70 异乡人的焦虑和恐惧

- 73 一个小人物的成名史
- 76 媒体 2003 年度文化新闻述评
- 81 书商的魔法和孩子的梦
- 84 文艺批评的红包、黑包和白包
- 87 “短信息”救不了文学
- 90 全球化与“倒时差”经验
- 93 愤青与小资与乌合之众
- 96 黑匣子和人类高速移动的噩梦
- 99 食品转基因和文化转基因
- 102 伪社会学和农民的幸福感
- 105 失败的中学语文教育
- 108 2004 年的几个关键词

第二辑 符号等级制度下的文化实践

- 113 《2004 文化中国》序言
- 123 2004 年文化思潮回顾与前瞻
- 133 2004 年图书市场和我的读书生活
- 142 解密写作的意义和市场效应

第三辑 当代文学的政治经济学

- 149 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和结构转型
- 165 青春小说及其市场背景
- 176 谁在“戏说”阿庆嫂
- 181 文学与公共领域
- 197 萨达姆和拉斯科尔尼科夫

203 女性，房间和文学

第四辑 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述评

- 209 虚构作品的思想形象
- 219 身份变乱的寓言
- 228 镌刻在疤痕上的文字
- 237 奈保尔，作家和故乡
- 245 媒体时代的奈保尔
- 254 萨拉马戈及其创作
- 259 晚年的索尔仁尼琴
- 264 疯狂的作者和变态主人公

第五辑 流放者的归来

- 273 爱黑夜的人
- 278 为亡灵弹奏
- 282 慌乱的回声
- 286 致命的激情
- 290 在劫难逃
- 295 白银时代的遗产
- 304 异端史与思想史
- 316 一个流放归来的疯子

代跋：文学生涯——访文学评论家张柠/孤云

第一辑

生产中的文化与媒介中的文化

速朽时代的文化肥胖症

我们正处于一个“速朽时代”。“速朽”就是迅速腐烂，它同时伴随着“速生”，使植物呈现“虚胖”的生长势头。在温暖潮湿、充满欲望的气候中，物质既“速生”也“速朽”。对人构成威胁的不是物质的生长速度，而是因“速生”带来的“速朽”。与此相反，北方的物质不易腐朽，但也不易生长，新陈代谢速度缓慢，物质形态显得保守，恒久，与南方物质朝生暮死、宛如蜉蝣的特征构成鲜明的对比。

农业文明或者游牧文明就像“北方物质”，现代工业文明或者资本主义文明就像“南方物质”。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隐喻。与北方的“文化生长迟缓症”相比，“速生”和“速朽”是文化“南方化”的重要标志。所谓的“全球化”，就是文化上人为的“南方化”——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和传播手段，人为地增加温度和活力，人为地加快物质生长速度，人为地缩短产品加工周期、缩短资金流通周期、缩短儿童成长周期、缩短恋爱周期、缩短文学生产周期，报纸杂志在不断扩版，文化集团在不断壮大……全球性的“文化肥胖症”因此而产生。



商品生产和消费，重演了“文化肥胖症”那种“速生—速朽”的喜剧。产品不断更新换代，版本不断升级又不断地被废弃。人们在消费时尚的压抑下不断地跟风。它导致旧产品的使用价值人为贬值（资源浪费），并用交换价值（产品畸形发育的形式的新奇性）取而代之。与使用价值相应的交换价值，就是“商品肥胖症”的根源。

全球文化“南方化”的逻辑（“速生—速死”逻辑，商品交换逻辑），正在制约着精神文化生产。文化创造和文化交流，变成了文化工业和文化交换。从数量上看，文化产品的生产量极大，就像沼泽地里的野草一样，但迅速腐烂、死亡。从质量上看，产品的生长跟腐烂是同步的，并用腐烂来催促生长。从速度上看，生产周期缩短，死亡周期也同时缩短（就像饲料鸡）。结果是，除了“更新换代”、“版本升级”之外，我们什么也看不到，我们见到的只是“速度”、“速度”，一种飞速生长和死亡的速度。是“速度”将传统的“文化侏儒症”变成了一种具有时髦外表的疯狂生长的“文化肥胖症”。这种文化肥胖症，将隐藏在“速生”背后的“速朽”问题推到了矛盾的中心。这就是“文化焦虑症”的根源，对文化虚胖和死亡的焦虑。

近年来文学的情况，与这种“速生—速死”的逻辑是一致的，出现“文学肥胖症”也是必然的。比如文学命名，原本是与文学自身的规律，或文学与社会思潮的关系相关的。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的“新生代”，是文学“时间命名法”的开端，目的在于对更早的“时间”宣读死亡判决书。这的确是一种新的“生长”形式。但它迅速为自己招来了一个“死亡”的形式，那就是随之而来的更新的“时间”——“70后”宣判了“60后”的死刑，“80后”要宣判“70后”的死刑。据说有书商正在筹备策划

“90后”。速度（时间）和商品的新奇性，决定了作家创作寿命的“速朽”。这就是生长速度催促下的“文学肥胖症”，它最终将导致文学因过于肥胖而休克。

如今，文化生长之快和腐烂之快，已经接近病毒软件了。在这个疯长的过程之中，策划、宣传、印数、利润，就像“文化催生素”，人为地让文化“抽条”、“发胖”。“速朽时代”残酷的数字逻辑和速度逻辑，就这样将各个领域的青年都变成了“文化肥仔”，他们正在市场上流窜，满脸流着文化脂肪肝。我们现在急需的不是文化催生素，而是文化减肥茶。



帮忙文人和中国精神重建

6

每一个时代都会有“世道浇漓，人心不古，世风日下，国将不国”的议论，怎么办呢？于是出现了改朝换代的革命家，还有修修补补的改良家和改革家。秦始皇和孙中山等人都是革命家。至于改良家和改革家就多了，每个朝代都有，他们比革命家还要繁忙得多。文人则分为两类，一类帮闲，一类帮忙。与帮闲文人相比，帮忙文人还算是有点“替君分忧”的责任心。他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，主要是清议和进谏。他们的手段一般是将“现在不好”这个问题转换为另一个问题——时间上的“过去很好”，或者空间上的“别人很好”，借此来帮革命家和改良家的忙。

古代文人的立论依据是“过去很好”，“现在不好”，最好的时代就是尧舜禹的上古之时。他们帮助君主加强道德和礼仪的控制，试图将人心引向所谓的“淳朴”、“清心寡欲”的远古时代，也就是让人们自己将自己阉割，省心又省力，从而达到简化统治者管理程序的目的。用“过去”蒙骗中国人，整整持续了几千年，直到我们发现“别人很好”。“五四”时期文人的主要立论依据就是说“别人很好”，我们得向别人学习。学了整整一个

世纪之后，今天好像开始有一点“别人”的意思时，帮忙文人又发现了新问题，不是“别人很好”，而是“别人不一定好”，甚至很坏，还是咱们自己好，于是，问题又回到了“过去很好”上面了。与此相关，帮忙文人开出了大量的药方：读经、复礼、立牌坊、规范道德秩序等等，就差没裹脚。

空间上比较得出了“别人很好”的结论，不一定全对，但它改变了传统社会内部的权力结构，这是“五四运动”的功绩。时间上的“过去很好”（中国式的乌托邦）是一个没有比较、判别的假定，全凭文人的三寸不烂之舌在絮叨，结果永远是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兜圈子。今天，帮忙文人又在急促地呼吁重建“中国精神”，当然不仅仅是建立在“过去很好”这样一个老的、简单的假定之上，而是配上了一系列有现代感的新假定。他们首先假定，传统权力形态已经萎缩，公共空间已经扩大，因此公众必须要有自我教育、自我约束的能力，所以要“读经”，要有道德意识，最好有一种信仰。其次是假定，商业或市场精神是罪魁祸首，是道德滑坡的根源，因此要培养反市场的道德和人文精神。第三是假定，文人能够起到示范作用，不但要帮忙，还要身体力行地实践。

帮忙文人绞尽了脑汁，想得也很周全。他们居高临下，试图将自己的假定作为国家管理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。既然这么周全，既然所有的人都自我阉割了，那还要国家管理干什么？国家主张要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。这种需求既包含了个体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，也包含了个体超出生存需求的欲望。两者的界限尽管不好一刀切，但也不能为了管理的简便而搞道德上的一刀切。管理者的能耐不是体现在个人道德自律的基础上，而是体现在人们的欲望得到充分张扬的基础上。对

于后者来说，管理者的难度增加了，程序复杂了，责任加大了。这是现代管理者的职责。

帮忙文人整天忙于精神重建、道德自律，似乎要让大家都变成白痴，让管理者变成护士（让吃药就吃药，让睡觉就睡觉，让上操就上操），而根本没有提到法治精神、法治建设和管理者的责任。这种典型的帮忙文人的思维，是传统社会的臣子思维的当代遗毒，看不到一点当代知识分子思维的影子。

文化评价的有罪推论和无罪推论

近期我们同时听到了两种观点截然相反的“盛世危言”。分开来看，他们都振振有辞，放在一起就显得十分荒唐。

第一种观点是由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提出的。他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老祖宗“易经”的思维方式，阻碍了近代科学萌芽在中国的发生。他认为“易经”和中华文化思维中的“天人合一”思想，将人世间的规律和自然界的规律混为一谈，与近代科学摆脱古老的“天人合一”观念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。这当然不是什么新观点，“五四”时期就有了。但杨振宁的潜台词，是不是说“五四”的科学启蒙任务并没有完成，我们现在依然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科学理性和民主精神呢？这是我的推测。

另一种是由上海学者盛邦和提出的，他附和日本学者堺屋太一“文化比经济更重要”的观点，认为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过程中所隐含的诸多危机里，民族文化信仰危机最可怕。他像文化官员一样提出了一个“三国”教育策略：国情教育（解决国家与社会的矛盾）、国史教育（解决民族凝聚力问题）、国学教育（解决文化精神认同问题）。盛邦和考虑问题的核心不是科学和启

蒙，而是试图通过教育和想象，来增强民族凝聚力。

这两种观点，一个是带有近代西方民主色彩的科学主义思维，一个是带有传统东方权威色彩的民族主义思维，一个有“西方中心论”色彩，一个有“东方中心论”色彩，骨子里针锋相对。对他们观点本身的是非对错这个复杂问题，我们暂且不予过多地评价，我们来关注一下他们的思维逻辑。

有学者用“算卦”和“中医”为例来反驳杨振宁，缺乏说服力。中国近代科学的落后是一个事实，但杨振宁的批评采用了“有罪推论”的方式，往上倒推，断言科技落后的原因在于“易经”和“天人合一”等古老的东方思维。“有罪推论”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（或者中国司法制度的核心，不管有没有罪，先打40大板再说），它被一位推崇西方文化的人使用了。

当代中国社会的问题，可以放到全球化背景下来分析，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阴魂不散也是一个重要原因。盛邦和简单地推论：“中国目前最大的困惑恰恰是市场自由主义侵入了整个社会领域，包括政治与文化。”相反，盛邦和对传统中国文化采用了“无罪推论”的方式，认为现实出了问题，是因为“无罪”的、“优秀”的传统文化被抛弃了，必须重新进行“国学”教育（大家最好都要懂一点“易经”和算卦的本领）。“无罪推论”是西方人的思维方式（或者西方司法制度的核心，主要是针对具体的个人，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），它被一位推崇本民族文化的人利用了。

他们两人都涉及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评价。杨振宁关注的是历史更为久远的中华文化思维的毛病；盛邦和撇开了对传统文化的毛病的讨论，只是关注如何解决近期国家和民族的现实问题。我觉得他们两人的思维逻辑恰恰是弄拧了。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